

陸灝新聞作品選

LUHAO
XINWEN
ZUOPIN
XUAN

文匯出版社

DZ89/05

陸
灝
新
聞
作
品
選

顧
廷
龍
題



文 匯 書 報 社

1201869

封面题字：顾廷龙

责任编辑：沈国祥

封面装帧：范一辛

陆灏新闻作品选

陆 灏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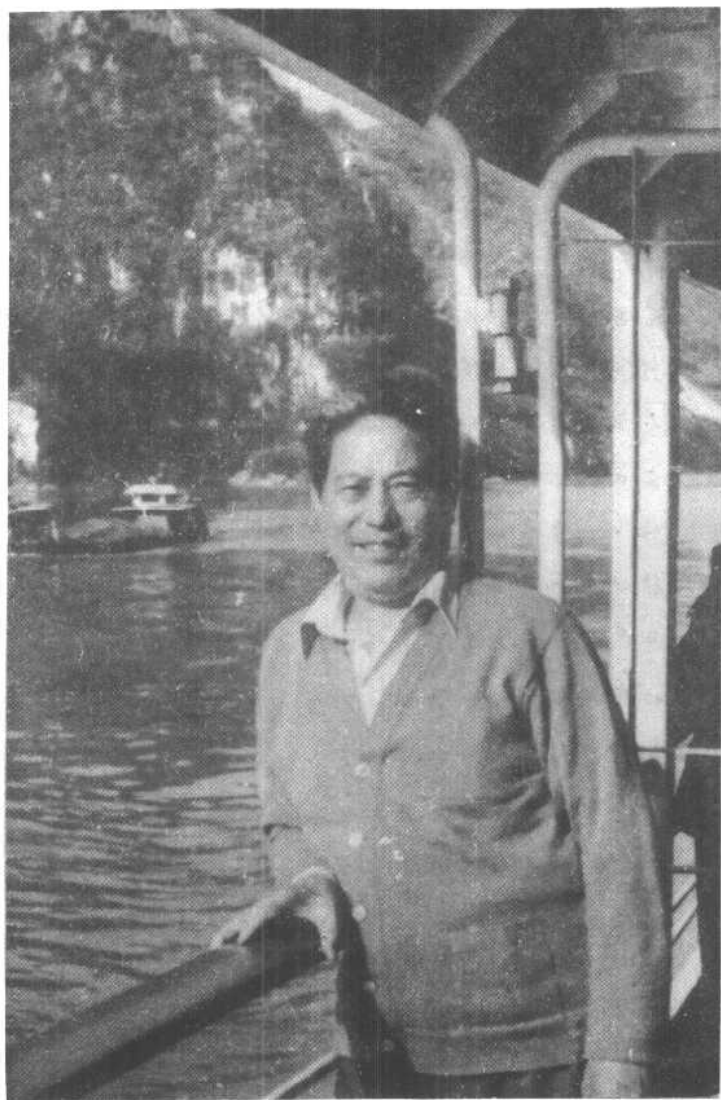
1990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30,000

印数：1—2000 印张：14.25

ISBN 7-80531-132-3/B·75

定价：5.80元



1985年10月作者路过长江三峡

难忘的记者生涯

—作者后记

我从1943年秋起任《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开始，到1957年冬离开《人民日报》，绝大部分时间做的是记者工作。之后，有一年时间是任复旦大学任教。从1958年秋天起，我长期在《文汇报》做总领导工作，到1985年离开岗位，一直有机会和记者的工作保持着联系。回顾从30多年来新闻工作的实践，最使我难忘的还是14年的记者生涯。那段时间，我写得较多的是人物方面的通讯、特写，文章的主人公多是我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天津、唐山以及从天水到兰州沿线采访，从山沟沟出来又看到3个大城市、大工业，什么新鲜到新鲜。最初我

本书作者后记原稿

记者与时代

——代序 郑重

—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成为历史;新闻比历史更有价值。新闻是今人写的,历史是后人作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读了这本《陆灏新闻作品选》,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是因为它虽是新闻作品,但其内容足可以作为历史的证人,证明着那个时代。

和这本书作者相比,我是晚生了多年,但我们毕竟是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人,而且共同经历过一段历史。书中的诸多篇章,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初读它们的时候,那带着油墨的芳香,陶醉着我那颗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心。那些人物身上的那些事情,经过作者的笔娓娓地写来,不只是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而且似乎还在鼓舞着我要干些什么事情。

如今,我再读它们的时候,刊载着它们的报纸都发黄了,变脆了,油墨也失去了光泽,那芳香的味儿也消失了,我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中学生了。但我感到它们像历史老人,用沉思的目光看着我,使我的思维进入一个立体世界,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你还记得那个时代吗?我们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

着那个时代。

奇怪，为什么我在初次读到它们的时候，会没有这种感觉呢？

这大概就像站在地平线上观海那样，总觉得大海是平面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喜马拉雅山，看看沙漠，就会感到惊奇：海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山，那沙漠，在当年的当年的当年也是大海。如果那时有人类，观海者的生命又能延续到今天，再看看他们曾经看过的大海，那感觉也会错位的。现实的人看现实的世界，总感到大海是平面的，而且有苍茫难测之感。

曾经沧海难为水。涨潮的时候，那潮头，那浪花，那涛声，的确令人惊心动魄，眼花缭乱，那是弄潮儿的天地；汐落潮退，一切轻飘而浮动的东西，又被潮水席卷而去，而留在海滩上的都是沉甸甸闪闪发光的東西。如今，当我捧着这本书阅读时，就有着走在落潮后的海滩上漫步的那种心情。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老孟泰、王崇伦，还有刚从乡下来的混凝土工人李有财、钻探工人孙祥、老工程师程世通、女工长李延馨、材料员赵守志、电焊工人贺善述、初到工地的大学生成瑞珠、二号轮长王泉林、潜水员戴金海、工地广播员赵兴云、工地护士王锦葵、以矿为家的王茂元……对这些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事以及他们那个最普通的生活世界，作者像一个掏金者那样，进行执着地挖掘、探索与筛选，描绘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那是一个讲究奉献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无私为荣的时代，那是一个富于理想与追求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时代。

作者以无比的自信认为，这一切都应该是永恒的。

二

一篇篇文章是作者留下来的脚印。我随着这些脚印，跟着作者从北京走到鞍山，又从鞍山走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在战争年代，他和八路军战士们一起，腰上挂着手榴弹，行军、宿营、睡门板。战争过去了，迎来了和平，他的生活应该安定了，但他并没有窝居北京守着自己的家，仍和战争年代一样，奔波于建设工地，住进工人的工棚，在混凝土搅拌机旁，在电焊机旁，在钻探机旁，在与洪水搏击的小船上，他沉得是那样深，沉得又是那样持久。

中国有句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他的文章中，我感到他不是为了得到虎子才去深入虎穴的，他本身就是生活在虎穴中的一只虎。他不是对生活的采访者，而是生活的参加者，作为生活中的一员，他手中的笔就像工人手中的焊枪、钻机那样，时时刻刻在为生活奉献着。他笔下人物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那些人物的感受也就是他的感受，他为那些普通的人物写着写着，如同那些普通的人为祖国的事业那样，看作是人民和党的叮嘱，看作是苍天赐予的责任，是自然之神的安排，他非得那样做不可。他是那个时代的儿子，他拨动着自己的心弦，他的心弦和时代的弓紧绷在一起。

作者用来构造时代堡垒的不是大话式的空心砖，所以它没有某些文学创作上的虚幻，更没有所谓理论上的拔高，而是真实地表现那个客观存在的美好的时代，以及用时代的乳汁哺育成的美好的人。因为他们是真实的，所以才具有朴素而自然的特色。

正如雕塑一样，汉代的石人石马不同于晋唐的佛像，希腊的风采有别于巴洛克的神韵，这些时代风格的区别都是通过艺术

家的艺术构思、意境的追求，以及服饰的摺纹、眉眼线条的不同刻法体现出来的。本书的人物通讯、特写中的那些人，不是战争时代的人，也不是现在的人，而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是通过作者的精心雕刻而成。

《他从乡下来》中的李有财，有着浓厚而鲜明的农民意识，但在作者笔下表现出来的，时代的乳汁把一个农民哺育成工人。刚从乡下来到鞍山的李有财，梦想不到的鞍山建设使他大开眼界，兴奋得睡不着觉，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头小毛驴，但吃饭却要排队，刮风下雨还要上班，这又使他感到别扭。下班以后，脚上拖着公家发给劳动保护用的长统胶靴，而把自己新买的一双球鞋却一前一后地挎在肩上。到后来，他发现用混凝土浇灌的基础不合格，又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那双挖混凝土的手磨破了皮露出鲜红的肉……

李有财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李有财，这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的思想，写出了他看问题的方法，写出了他的心理语言。解放之初，大批农民涌进城市，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作者写这个李有财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写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又是从意识的深层次中表现出来的。有没有因为作者写了李有财的农民意识，就感到工人的李有财就不可敬了呢？相反，这个李有财使我们感到可敬可亲可爱，是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人物特写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真实，只有这种真实才能从人物身上表现时代的特色。作为社会的人，用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这样写出来的人会失之真实；如果离开人物的自身行为和精神世界，用作者的意念去塑造那个人，由于服从某种需要，把一个复杂的、多棱体的人变成一个单一的、纯而又纯的人，这样理想化了的人就会脱离他生活的那块土壤，

失去人物的真实性。

《王崇伦的故事》中的王崇伦，他有着多么丰富多彩的自我的内心世界。王崇伦的故事是从他没有涨上工资引发出来的。他的技术很好，而又自以为靠技术吃饭的人，偏偏没有涨上工资而闹起了情绪。他自己给自己放假，他去捡粪，他遇到熟人感到别扭，他躲起不见来家访问的干部，直到后来他发明了新的工具，连徒弟也为之高兴，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高兴得太早……他的一切都处于矛盾中，而且又是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步走向自我的完善，这就更加显示出王崇伦的英雄本色。王崇伦的这种固有的性格，直到30年后在他担任市长的工作中，仍然鲜明地表现出来，他能面对现实，不断克服自身工作中的弱点，在开拓中前进。这时，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对王崇伦的性格把握得准确，对王崇伦的精神境界理解得深刻。

作品的时代精神，就是真实地、准确地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精神。

三

时代与人，不是指那个时代与一个具体的人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构成不了那个时代，而是指人的群体，是指这个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多维的世界，有和谐，也有不和谐；有统一，也有矛盾，这大概就是古代说书人总是喜欢说“花花世界，朗朗乾坤”吧。

作者是怎样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多维世界的呢？

为了把握着作品的思路触角，我们不妨把作者的人物特写在时间上加以排列，可以发现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集中在1953—1956年之间，地点主要在鞍钢和武汉长江大桥这两个地方，

素材又多是取自鞍钢的混凝土队和武汉长江大桥的钻探队。

老实说,这是两块硬骨头,对一些作者来说,那是两块无法啃的硬骨头。对此,我是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的。试想看看,那钢筋,那水泥,那探机,那焊枪,那机床……哪一样不是硬梆梆的,有什么可写?又从哪里着手去写。可是本书的作者去写了,而且把他们写出来,写得又是那样多,那样生动。30多年的时间过去,只要是从那个历史时期走过来的人,谈起这两个地方,人们还是能清晰地记得起并说得出作者为这两个地方所留下的文字,这是为什么?

作者的窍门并不难找到,就是因为他写了人,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传授经验中,师傅与徒弟的关系;在劳动竞赛中,班组与班组的关系;在抢险急救中,认真负责的精神与小小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知识层次中,老工程师与普通工人的关系;在年龄上,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关系;在家庭及婚姻恋爱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诸种关系又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展现出来的。

生活中最生动的东西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引发而成为恢宏的作品的。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新闻人物通讯就把人物之间的关系写得简单化,更没有用主观的意愿去改造人的这种关系。他有选择、有集中,并没有人为的美化与拔高。对同一个事物,人们会有不同看法;在同一环境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使有着共同的认识,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又不相同。作者的笔墨常常是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着力的。

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作者是如何地巧用心机。一次运粘土就写了人的群体对大桥工程建设的关心,一个广播站日日夜夜牵动了那样多人的心,医务

室的一位女护士能千方百计把温暖送给那样多的人，浇灌水泥留下的隐患狗洞，油库漏水……别人想到的，他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想到了，也写出来了，许多文章都给人有新意。现在，我才深深地感到，作者留给那个时代的不只是篇篇文章，而是留下了整个一颗心。

是的，作者是用整颗心去感受那个时代。一个记者不能靠感觉生活，跟着感觉走更不行。但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记者不能没有自己的感受。新闻作品中的时代气息不是靠被采访的对象说出来的，而是要记者去感受。这本集子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作者时刻都在捕捉自己的感受，他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感受倾注在作品中。他感受到电焊工的忘我精神，他感受到老工程师的科学态度，他感受到那对热恋着而又无暇结婚的未婚青年的纯真爱情，他也感受到那些家属们对丈夫的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如果说，在写鞍钢建设这组人物通讯中，作者的感受在作品中还没有充分发挥的话，而到写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作品中，作者的感受就更深刻鲜明了。那风，那浪，那木船，工人们在水上工作的情景，渗透着作者的感受，作者的这种感受又是如此地亲切而具体地通过他的新闻作品传递给读者。没有感受就不能产生感情，只有具备了丰富的感情才能动人。许多年之前，我和作者还没有相识，读了《风浪来了》使我感到惊奇：他是怎样采访的呢？他把自己的感受写得那样可以触摸得到，他似乎与小船共命运了。

后来，在复旦大学听过他讲授《新闻采访写作》课时，许多同学都问他是怎样采访的。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在少年时期就曾在长江水面上的那种木船上生活过。再后来，他是《文汇报》社的领导，我是一名小记者，经常看到他从复旦坐电车到报社上班时·

要经过苏州河上的乍浦路桥。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站在桥头，默默地、深情地看着苏州河上那些小木船。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对那些小木船特别有感情？”他说：“我是船民的儿子，小时候曾经在那样的破木船上背过辘，摇过船。”直到这时我才懂得，他为什么能在《风浪来了》中，把小船与风浪之间搏斗写得那样出神入化。就像一位优秀的诗人功夫在诗外一样，他的功夫也不在采访之中，而是有深厚的生活根底。

四

随着作者的足迹，我向他记者生涯更深层走去，发现他的生活领域变宽了，视角变广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只是去感受它，而且去思索，往往是思索多于感受。这就是说，他不只是感受到那个时代，而是更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时代，所以他的作品给人一种透视感。

理解的本身就是热爱。对时代理解得越深，才能爱之越烈，讴歌是对时代的热爱，用新闻的武器来捍卫这个时代，同样是一种热爱。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自同一般的心底。

读着作者的《工作研究》这类报道，我感到他作为记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的革命生涯使他对从事的新闻工作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工作者，关心社会，关心生活，关心周围的一切，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一个记者只关心自己鼻子底下的事，而对群众的痛痒、工作的得失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是不可思议的。党要通过千万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新闻工作就是千万条线索中重要的一条。他在记者工作中，努力了解群众的情绪、呼声和要求，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反映给报纸编辑部，反映给中央。

人们知道，50年代中共中央对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过两次决定，这对于保持好党风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作者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曾经聆听过刘少奇在1948年10月2日的讲话，这次讲话允许记者在实践中考察党的政策是对了还是错了。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这些文件和讲话对于本书作者的新闻生涯发生了很大影响，作者的一系列《工作研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关于上海征收营业税的几个问题》一文，讲的是上海的税收实行“自报实缴”的政策，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发生工商户严重逃税行为，使国库收入损失很大。这是当时上海市政府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损失，记者披露了这个问题，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他觉得自己不能辜负党和人民赋予他的使命，必须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责任。1957年的5月，当辽宁地区的猪肉供应开始紧张的时候，他感到这是关系到人民生活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看到人民的肉食发生了问题，想到井下、高空作业的人、托儿所的幼儿和医院的病人吃肉都会受到影响，这使他非常不安。他从辽宁省有关领导部门一直到基层，凡是与养猪有关的部门，他都走到了。调查研究，倾听意见，他发现许多有关的政策没有落实，挫伤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写出了《光靠指示和号召是不行的》调查报告。作者不是光凭满腔热情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的工作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之上。分析一下他的几篇调查报告，可以发现有着共同规律：大量地占有材料，用事实说话，看了他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便会知道如果是用轻飘飘的办法是无法得到的。作者经常采用的是比较法。他说上海营业税负担轻了，是和青岛、芜湖、杭州、无锡、南京等城市比较中得来的。他写《捂着好，公开好？》，也是

用几个农业社的材料进行比较的。比较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通过比较就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虽然经过了一个历史跨度，但作者对新闻工作的探索精神并没有泯灭，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仍然虔诚。1984年他去青岛，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他乘坐那条7000吨的新船，用了还没有几年，就已经有点面目全非。有些设备本来可以派用场的，却弃而不用；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却是又脏又乱。旅客的呼声没有人理睬，船员有力没有地方使，他心中有着难以抑制的不安，于是就写下了《在去青岛的船上》，为旅客们、船员们发出呼吁。看来，一个记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要关心人民的生活，关心周围的是是非非，把人民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把人民的疾苦看成是自己的疾苦，把自己的心和人民的心紧贴在一起。只有这样，工作的热情、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持久不衰。

翻翻1957年的《人民日报》，可以发现从4月9日到5月18日这样短短的时间内，作者就写了4篇《工作研究》。作者所以能做到这样，除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之外，这与党当时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很有关系。批评上海市营业税过轻，身为市长的陈毅同意发稿；批评辽宁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欣然同意发表。再就是报纸编辑部的有力支持，否则这些文章无法见诸报端。报纸不但给予版面，而且不少文章都放在突出的地位。有的文章，报纸编辑部还写了编者按，表示支持，加以推荐。这些，连我这位读者也要替作者感谢报纸的总编辑和编辑们。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记者和报纸总编辑、编辑是相依为命的。报纸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记者能很有光彩地活动在报纸版面上，没有总编辑的领导和支持，给记者创造条件，和记者一起承担风险；没有编辑们出主意，巧编排，画龙点睛地加上好标

题，再能干的记者也无法在报纸这个舞台上亮相的。作者在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一再同我们谈起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高尚风格和对部下的同志之情。也许由于作者有着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所以在他担任《文汇报》领导指挥记者工作的时候，能善解人意，体谅记者的苦衷。我的结论是：没有好的编辑，记者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出名记者。

五

一个记者应有着特殊的品格，而这种特殊的品格又是由时代造就的。本书作者就是这样的人，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从他参加革命那一天起，他对党的事业有着强烈的追求。特别是当了记者后，他把从事新闻工作看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和所有青年人一样，作者也有过他的青春时代。他也曾是一位富于幻想的青年，有着塑造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他17岁离开上海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开始，他在文艺团体跑龙套。他是一位喜欢学习的青年，又和其他青年有着共同特点，都受着苏联文艺的影响，行军的背包里有他手抄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诗篇。他也曾想当个诗人，并试写过若干诗，但却缺乏信心。他喜欢过音乐，但又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音乐细胞。但写作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而且越来越强烈。再后来，他就为报纸写些战地通讯，结果文章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这就激发了他想从事新闻写作的热情。不断地给报纸投稿，稿件又不断地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在一次工作调动中，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特派记者，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人总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有了理想才有更大的力量。算起来，他带着这种理想生活，也快近50年了。

近 50 年新闻工作的岁月，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可惜这本集子里，没有留下他在战争年代追寻的信息。从他的自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在去鞍山之前，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开始只注意写工程的表面，没有注意写人，经历了写来写去写不好的摸索阶段，还是文学的表现方法给了他启发，使他知道在新闻通讯中也应该把写人放在首位，要向人倾注全部热情。写人就不是坐办公室、看总结报告能写出来的，迫使他到生活中去，到人群中去，像作家一样去体验、了解、熟悉生活。他写的鞍钢建设的人物特写，弥漫着文学的气息。到了武汉长江大桥，他的作品就走向成熟了，对材料的调遣及写作手法的运用都熟练起来了，他能以小见大，写得轻松自然，有的作品写得小巧玲珑，写出了一种意境，很耐读了。

让自己长期地沉浸在火热的生活中，从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在真实的前提下，把文学上的素养运用到新闻写作中去，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新闻作品能表现得更加生动活泼。搞文学的人常常要从记者那里获得新的信息，记者又为什么要忽视文学给你的力量呢？懂一点文学，丰富自己的知识，多掌握一点写作手段，也是做好记者工作必不可少的。既是记者又是作家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为作者感到惋惜，他的记者生涯结束得太早了。他走上大学讲坛太早了。他走上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太早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想他的新闻作品会有更多的读者。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在那个时刻就结束记者生涯，以后的记者又怎样当呢？他的生活又会怎样？所好，他并没有离开报纸，他的时代责任感仍然在报纸的版面上体现出来；他那认真而精细的工作作风，仍然渗透在报纸的编排中；对许多事情抓住不